



人文译丛 从土地到循环

# Writing Security

## 塑造安全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政策

[英] 戴维·阿耶尔 著  
李 中 刘高雷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人文译丛 总主编◆何怀宏

# Writing Security

## 塑造安全

——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政策

[英] 戴维·坎贝尔 ◆ 著  
李 中 刘海青 ◆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JILI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塑造安全: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身份认同政策 / (英)坎贝尔著;李中,刘海青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0.11

(人文译丛)

ISBN 978-7-206-07173-7

I. ①塑…

II. ①坎… ②李… ③刘…

III. ①美国对外政策—研究

IV. ①D8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96258 号

## 塑造安全

著 者:(英)戴维·坎贝尔 译 者:李 中 刘海青

责任编辑:刘 洋 刘 学 封面设计:张 迅 孙浩瀚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制 版: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长春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720mm×1000mm 1/16

印 张:22.25 字数:30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7173-7

版 次:2011 年 1 月第 2 版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2.00 元

---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 总 序

中国乃一文明古国，而人文精神又于其间特见其长。“周文”已灿然可观，而孔孟老庄荀韩等先秦诸子更大略厘定此后二千年中华文化发展基本格局，且时有奇葩竞放，异彩纷呈。然近代以来遇强劲欧风美雨，不免花果凋零。究其因，既有外来文明之横决，亦有自身后继之乏力。

今日世界一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可能孤立发展乃至生存，古老的华夏文化更有从域外接引各种源头活水之亟须。百年来国人译事多多，今不揣浅陋，亦立此一“人文译丛”，名称不惮其大，俾使各种有价值译著多能收入其中，且有愿为中华人文复兴略尽绵薄之意焉。

译丛取材选目则不吝其小，且力求主题相对集中，现约略勒成数专辑：一曰西方古典思想与人物，尤以古希腊为要。二曰西方政治理论与实践，特重近代以来作为西方思想制度主流之自由民主的发展。三曰知识分子与自由市场，全球化使我们皆卷入市场经济，而人文知识分子对此的态度尤可玩味。四曰基督精神与人文，此种超越性大概正是较现实的中华人文所需特别留意处。五曰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思想，藉此希望国人眼光也能注意我们近邻心灵的深邃。六曰《学术思想评论》，由贺君照田主编，其中有译有评，最近几辑尤注意中西历史交叉延入“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

数年来能有此初步实绩，端赖吉林出版界领导周君殿富、

胡君维革大力支持及责编与诸多译校者鼎力相助。“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人文复兴并非“指日可待”之事，我们愿使“人文译丛”成一长久事业，除继续充实现有专辑外，亦将开辟新专辑，并深祈此一事业继续得到各界同人的关注与支持。

何怀宏

2002年11月18日

谨识于北京西郊泓园

# 重版总序

凡是在出版业工作的人都知道一句行话，叫做“选题定位”，或曰“图书定位”，亦曰“市场定位”。我非常赞成这句话。一个出版社必须进行明确的选题定位，只有明确的选题定位，才能打造图书品牌乃至出版社品牌，只有有了品牌才能占领市场，出版社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近些年来，我社的选题定位是十分明确的，就是主打国内外学术类图书。就国内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60年实录》（10卷）、《北大哲学门》（10卷）、《高清海哲学文存》（6卷）、《孙正聿哲学文集》（9卷）、《楚辞源流选集》（5卷）、《中日甲午战争全史》（6卷）、《毛泽东评点的帝王大传》（16本）、《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6卷）等高档次、高品位的学术著作，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较好的影响。就国外的学术著作而言，我社先后引进出版了《人文译丛》（60本）、《绿色经典文库》（16本）、《大美译丛》（8本）、《支点丛书》（10本）、《世界经济畅销书系》（10本）、《人类文明史图鉴》（24本）、《西方社会科学基础知识读本》（22本）、《美国思想史》、《西方建筑史》、《剑桥战争史》、《剑桥医学史》等在世界上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受到了国内学术界的好评。从总体上说，图书的价值主要在“传承”和“传播”4个字上。“传承”是就历史纵向而言，图书要为后人传承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成果；“传播”是就历史横向而言，图书要向世人传播人类创获的思想文化知识。我社出版的学术类图书，虽然远远没有达到这个境界，但我们一直向着这个方向努力。

在我社引进出版的外国学术类图书中，最有影响的是何怀宏先生担

任总主编的《人文译丛》这套丛书。何先生是一位学术精深、工作认真、待人诚恳、诲人不倦的专家学者。为编好这套丛书，他亲自确定书目、遴选译者、审阅书稿，每一本书都饱含了他的心血。功夫不负苦心人，经过10年的努力，到现在这套丛书一共出版了60本。一个地方人民出版社能够出版一套60本的外国学术著作丛书，实属不易。每当看到这套丛书时，我们总是对这套丛书的总主编何先生产生由衷的敬意。

为了更好地保护《人文译丛》这套品牌性图书，最近，我社调集30多名资深编辑，对这套丛书进行了重新出版。在重版过程中，我们主要做了以下三项工作。第一，将已经出版的《人文译丛》中的图书悉数收入，同时又从我社出版的外国学术著作中选出20本，加在《人文译丛》中，使《人文译丛》总量达到80本。第二，将收入《人文译丛》的80本图书，统一开本，统一纸张，统一版式，统一封面风格。第三，对80本图书进行重新编辑校对，对个别图书的有些文字或段落进行了处理。通过以上工作，使这套丛书更加完善了。

有人说：翻译出版一本外国学术著作，比自己撰写出版一本学术著作还要难。这话很有道理。由于我们水平有限，重版的《人文译丛》尚存在着以下三点不足。第一，有个别图书，从学科属性上讲，放在《人文译丛》中不甚合适，敬请广大读者原谅。第二，有些图书中的个别译文还不够准确，编校也不够到位，敬请广大读者指正。第三，有些图书中的思想观点，囿于历史局限，我们不能接受，敬请广大读者进行批判性的阅读。

重版《人文译丛》，对我社来说，既是一个巨大的工程，也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在三个多月的工作中，全体编辑、校对、照排和印制人员都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令我感动不已。在此书即将付梓之际，我真有许多感谢的话要说，纸短情长，不尽一一。

胡维革

2010年9月28日

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 前 言

动荡的时代要求人类进行非传统性分析。近年来，国际关系发生了巨大变化，对原来已经确立的国际秩序和国家政治活动中的传统做法造成了冲击，国际政治学中很多原有的分析方法已经不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在新旧时代交替的过程中，出现了很多不可预知的因素，各国政府以及著名研究机构纷纷警告，世界和平正在遭受非传统性威胁，呼吁建立国际关系新秩序。在众多警告中有一个主题显得尤为突出，那就是希望人类社会重新思考国际安全问题，重新评估传统威胁，并将它们与最近出现的威胁人类社会的新问题进行综合分析，找到合理的防范措施。这种警告背后存在着一定的情感因素，而且这种情感因素也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如果人们不假思索地接收这种情感及其主要表现形式，我们就可能感情用事，造成不可挽回的历史性政治错误。因为，虽然最近一段时期以来国际关系中出现了很多新的变化，使我们这个时代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从而使我们过去依赖的国际政治关系支柱迅速瓦解，反过来却可以让我们获得一个新的认识，即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突发事件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确，在不确定性和确定性之间建立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agonism）是确保国际政治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所以这种建议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本书提出的理论摆脱了传统分析方法的局限性，充分认识并利用时代转型出现的机会，对照传统分析方法提出的有关国家身份认同



的本质性认识，全面探讨了“安全”问题。具体来说，本书将“外交政策”作为分析安全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性因素），将美国的外交政策作为分析国际政治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不是高于一切的），分析美国国家身份认同是如何通过外交政策的实施被确立并不断改写的。从这个角度来看，本书与其他讨论国际关系的著作相比具有很大的不同。本书没有从美国的外交政策如何为国家利益服务这个角度入手，而是通过对国际关系的分析，透过表面行为，阐述美国外交政策如何促进国家政治身份认同的塑造和重塑。本书没有考虑遏制策略的外交动机，而是分析冷战时期的各种政策（外交的或非外交的）如何控制偶发事件和应对挑战，从而确保了美国当时在国际事务中的主导地位。对于其他书籍经常分析的所谓威胁“国内”社会的“外部”危险，本书多用了一些笔墨，对危险问题进行了额外陈述。本部分重点分析了内部与外部，自我与他人，国内与国外因素在处理威胁问题时的作用和关系（这些问题既受国家身份认同的道德因素影响，也受国土地域因素的影响）。简单地说，本书不是老调重弹地再次分析国际关系的有关问题，而是主要讨论国际政治中目前尚未解决的疑难问题。

由于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学等学科从理论上对主观认识研究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作者才有机会从中借鉴很多创新型的思路，希望以此分析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传统分析模式和做法。在此，我要特别感谢米歇尔·佛卡尔特，因为他的理论对于本书内容和作者本人的思想具有相当大的影响。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我非常推崇他的理论，但这并不是说他已经在自己的著作中充分讨论了有关国家和国家身份认同的问题。相反，我之所以特别推崇佛卡尔特的理论——相比之下，对其他学者似嫌重视不够，但是他们也有自己的独到理论，对我的研究也很有帮助——是为了证明如何正确引用他人理论的个人经历，而不是证明可以一成不变地利用他人的理论分析问题，并对众多因素作出判断。事实上，虽然我提出了一些有关国家、主权、



威胁和国家身份认同的新观点，但是希望读者以此为基础，进行更深更广的研究和探索。另外，由于本书篇幅所限，读者需要借助其他著作作为参考。任何对于国家身份认同的详尽论述，尤其是基于佛卡尔特理论的阐述，都希望读者能够对照其他经典著作，进行彻底讨论。简单地说，读者应该全面地对精英政治中存在的常见问题进行思考。虽然我在第八章中讨论了一些与此有关的理论性问题，但是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中，理论性争论只限于目前政府部门存在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这样，有效地控制了本书的篇幅，但是由于外交政策论述本身的开放性和丰富性，我反而认为这是一种明智的选择，因为读者可以有足够的空间进行独立思考，根据上下文融会贯通，充分理解国家身份认同问题。

没有哪本著作是作者一个人独自努力的成果，对于试图批判并发展某些已经广为人们接受的理论领域的著作更是如此。因此，本书提出的观点可以被看做与其他有关国际政治和政治理论著作的一种持续性的对话，包括（但不局限于）比尔·康纳利的《身份认同与差异》、詹姆斯·德尔·德瑞恩德《反外交》、迈克·狄龙的《安全政治学》、迈克·夏比洛的《象征政治学》、罗博·瓦克的《内与外》以及里查德·阿施礼的众多论著。事实上，这不是一个简单地关于象征问题的对话，因为在过去的几年中以上所有学者对我的著作进行了研读和批判，提出了他们自己的观点，对此我深表感谢。他们都非常无私地从学术上对我进行了鼓励和支持。而且，史蒂芬·戴维、理查德·弗莱斯曼、布拉德利·克莱恩、埃里克斯·文德特、约翰·霍普金斯妇女问题研究会（尤其是玛丽·浦玮女士），以及我主持的国际政治理论和美国外交政策研究生论坛的成员都对我进行了帮助，使我进一步发展完善了我的理论思想。虽然本书的再版与修改论文不完全一样，但是它的成功出版得益于吉姆·乔治对我的长期影响，他对我在研究方向的确立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此，我还要感谢一位不知名的读者（后来知道他是霍华德·凯吉尔），他对本书的完

善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建议。最后，我还要感谢凯特·蒙左，在我修改手稿的过程中，她也正在修改自己的书稿，但是她仍然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进行文笔润色，在此谨向她致以深深的谢意。

# 关于危险和对危险的认识

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变成了美国的威胁。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明显的——没有什么事比一个国家被另外一个国家侵略再真实不过的了，也是争议最少的。虽然受到侵略的并不是美国，但是人们却非常关注，也体会到了危险的真实存在。我并不想否认侵略行为的残酷性，但是这个插曲被赋予的毋庸置疑的地位值得我们深思。尽管如此，这样一个事件（它离美国如此遥远）<sup>[1]</sup>本身并不构成危险、风险或者威胁。美国的领导人很可能认识到，不管自己多么不喜欢国际形势的变化，当时的局势没有必要全面反击。虽然后来被证明是一场危机，但是开始时人们却对此进行了很多政治辩论，例如，美国应该如何做，以及做到什么程度。的确，世界上存在着很多类似的实例，但是美国对这些“事实”做出的反应却大相径庭：仅仅十年前，当伊拉克入侵伊朗的时候（像科威特一样，也是一个产油国），美国并没有正义凛然地进行谴责，或者呼吁采取行动，更不要说军事打击了。

危险并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它并不是一件独立于可能受到它威胁的人之外的事。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保险公司评估风险的方法。按照弗朗索瓦·埃瓦尔德的理论，保险是一种控制风险的技术，它的首要任务并不是赔偿或者补偿，而是通过概率的精密计算，判断计划的合理性并采取相应的行动。按照这一逻辑，保险业的危险（更确切地说是风险）“既不是现实生活中的一个重大变故，也不是一件普普通通的事……而是对可能发生在一些人身上的某些事件的具体处理方式”。换言

之，对于保险业中处理风险的技术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本身就构成风险，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风险。但是，反过来讲，任何事情都有风险，这完全取决于人们分析风险的方式，如何对待事件。正如堪特所说，风险的不同种类其实就是由于人们对事物理解的不同所造成的，对风险的理解可能出于敏感，也可能出于直觉。”<sup>[2]</sup>从这个角度来看，危险是认识的产物。危险与行动或者与可能产生它的事件之间没有本质的、必然的或者确定的联系。如果排除认识因素，从本质上来说，任何东西所存在的风险都和保险技术没有什么区别。

以上讲述的风险基础知识是很有必要的，对我们理解国际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但是，这并不否认世界上确实存在着“真实的”危险：传染性疾病、意外事故、政治暴力等确实可以产生生死攸关的结果。但是，并不是所有风险都具有同样的量级，而且并不是所有风险都被人们当成危险。现代社会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危险，而且因为风险实在太多，要想了解所有威胁我们的风险客观上是不现实的<sup>[3]</sup>。我们之所以认为某些事件或者因素是危险的，是我们按照危险标准对它们的不同方面进行分析判断的结果。而且，这个理解过程的正确性并不取决于“客观”因素的范围大小。例如，很多人认为艾滋病是美国公共健康领域的一个大问题，但是事实上肺炎、流感、糖尿病、自杀、慢性肝炎造成的死亡人数都比艾滋病要高<sup>[4]</sup>。同样，因为“非法”用药会产生危险的认识使美国掀起了一场“药品控制的战争”，而事实是合法药品的消费水平（以及由此而引发的死亡人数）已经远远超过非法用药的水平。推而广之，现在很多人认为“恐怖主义”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一个重大威胁，其实它在美国国内发生的概率很低（尽管在奥克拉荷马市和纽约市世界贸易中心发生了爆炸事件），而且恐怖主义造成的国际大屠杀事件也很少<sup>[5]</sup>。

此外，认识对于正确判断危险的作用并不仅仅局限于某些风险比其他类型更加严重这一过程之中。认识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它可以帮助我们建立某些认识模式，使我们可以清楚地分析危险因素。对危险的认识和构成危险的具体行为和“客观”表现之间存在着微妙的关系，社会舆论



也影响着某个风险所具有的威胁特征的多少，同时也是影响人们对危险认识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后面章节所分析的那样，正确判断某些事物是否是异端的、破坏性的、肮脏的、让人恶心的，对于美国人准确认识危险具有关键作用。

能够理解不同的生活方式，接受不同的身份认同，从而改变认为某种具体的身份认同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身份认同的错误认识，有时才能帮助我们正确理解威胁<sup>[6]</sup>。因此，只有从这些角度才能理解为什么某些国际政治大国提出的一些议案却不能引起某些国家的丝毫关切，而某些看似毫无威胁的事情，例如，南美某个作家的小说，却被当成威胁国家安全的東西，而作家本人得出的结论却是国家安全得到了保障<sup>[7]</sup>。所以，无论对于保险业来说，还是对于国际关系来说，危险都是对威胁诠释的结果，这种诠释应该客观地认识事件，按照规则处理各种关系，正确调整所谓受威胁民族的理想身份认同观念。

这些危险特征在海湾危机期间表露无遗。在宣布美国将派军队赶赴沙特阿拉伯时，布什总统说：“在一个民族的生命过程中，我们有义务表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具有什么样的信念。”<sup>[8]</sup>在详细解释了美国身份认同特征与危险之间的关系之后，这位总统着重指出了认识威胁与确认威胁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并巧妙地转向了他的研究成果：一个国家身份认同的确定是通过将危险认识融入外交政策而实现的。

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并非本书要讨论的内容。但是，这一事件却是一个很有用的参照对象，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本书提出的某些研究假设的总体框架。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怎么会成为美国最大的威胁呢？对此，有两种最常见的答案。一种是坚持用强权政治来认识世界政治的人的观点，其核心在于国家行为应该建立在国家利益得失的理性计算前提下，认为侵略是一件很容易理解的事，是对一个主权独立国家赤裸裸的侵犯。另外一种观点则是建立在经济主义的角度看问题，认为资本积累活动内在的驱动因素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行为，以美国为首的反应，像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一样，都可以通过石油、市场、

军工企业利益等角度得到解释。

上面的每一种回答都充满讽刺意味。关于这次危机进行的讨论的所有观点要比这两种观念复杂得多，很多人的分析与他们平素志同道合者的观点可能完全相左，而且可能与自己以往的主张格格不入。但是，我们引用这些观点的目的（我们可以粗略地划分为现实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是为了证明，虽然两个观点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但是它们都同样削弱了正确认识危险过程中的不可分割性。因此，这两种观点都犯有同样的错误，而本书的观点则与之不同。因为都建立在认知现实主义（epistemic realism）基础之上——即世界由物质构成，它们的存在独立于有关它们的认识或观念之外——这两种论调都认为，任何事物或者行为都可以找到其物质缘由。由于这种认知现实主义确实具有一定的正确性，这两种观点导致了另外两种分析方式：一种是叙述史学法（narrativizing historiography），在这种方法中，事物都有自我印证的特点，事物本身就可以解释问题；另外一种解释逻辑法（logic of explanation），在这种方法中，分析的目的就是确认那些可以自我印证的东西和物质缘由，然后分析者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取舍，实现自己期望的目的<sup>[9]</sup>。因为这种方法将各种要求、观念、认识割裂开来，认为事物“必然”是非此即彼的，这种方法是国际关系学讨论中最常用的一种超理论论述方式<sup>[10]</sup>。

但是，还有其他的思考方式可供我们选择，本书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方法。与认知现实主义不同，我认为认识过程就是利用现有知识去探索未知课题，而这一过程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借助理解诠释，所以说没有哪个认识过程是可以离开话语这一主题的。与叙述史学不同，我采用了历史表现法（historical representation），以历史本身的自然发展过程为基础证明我的观点。与解释逻辑法不同，我采用了翻译逻辑法（logic of inpretation），承认分类、计算和确定“真实原因”可能发生错误，然后针对采用不同分析逻辑所得到的明确政治效果进行研究，验证原来提出的假定。

由此看来，我的分析方法是国际关系中的一种新尝试，而且现在已

经有越来越多的人进行着类似的尝试，这些研究借鉴了众多现代思想家的研究成果——这些思想家在研究过程中特别重视分析历史上具体的话语模式，而不是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人为地割裂开来<sup>[11]</sup>。

我首先提出的观点是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由一系列实践活动构成，而事物则在这些实践过程中得以形成。这一观点并不想（也不期望）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形成新的方法论，巧妙地证明国际政治研究领域中以往往实践中所存在的漏洞，达到哗众取宠的目的。同样，我提出这种不同的观点也不是为了展示我多么自信，向世人表明只有我知道以往研究和实践中存在哪些误区，并在理论上提出普遍适用的解决方案。相反，这一观点借鉴了各家之长，尽管这些观点可能完全相反或殊途同归，有的来自国际关系学的经典理论，有的来自社会学和政治学近期涌现的优秀理论。这一观点又包容了各种不同的观点，囊括了国际关系中难点热点问题不同观点、不同研究方向和不同研究方法。这一观点分析细致入微，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判断，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并不是无原则地将不可调和的观念生硬地融合在一起，而是因为它能发现，尽管身份政治研究非常严谨，但是它仍然辩证地吸收了不同研究方法的可取之处<sup>[12]</sup>。它又是批判性的观点——虽然并不是怀疑一切——它既对国际关系研究中的传统理论进行了剖析，又对它们缺乏现实性予以了批判。这种观点并不强求在思想和现实、语言和事件、方案和事实之间谋求一个更好的契合点。相反，它对我们在实践中就这些方面的研究方法和原则进行了分析批判，它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历史事实如何影响了世界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上<sup>[13]</sup>。

因此，为了解美国外交政策对危险的认识以及塑造国家身份的具体做法，本书既没有采用纯理论的做法，也没有采用纯粹的历史观方法。也许，现实历史主义是理解这一观点的最佳视角，也就是迈克·福柯提出的互译方式<sup>[14]</sup>。现时历史主义（history of the present）并不刻意掌握过去的含义，也不会依据预定的原则和目标将过去单独割裂出来并给予完整的解释。现时历史主义并不是唯今主义（presentism——过去为今天的研



究服务)的一种具体形式;它也不是目的主义(finalism——认为今天的现实是由过去的核心目的决定的,现在是在这种过去目的的指引下发展来的,即过去确定了我们今天的现状如何)的一种具体形式。相反,现时历史主义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历史定位。这种分析方法从过去的—一个刺激因素入手——权力仪式的巧妙运用——试图探明权力仪式的发生、发展、壮大和对政治的影响<sup>[15]</sup>。总之,这种分析方法着重分析某些术语和概念在历史上话语实践中的作用。

虽然以上说了很多,但并不是说话语比非话语重要。当然,这正是反对这一理论的人经常攻击的一点,以便证明我们过分看重话语的作用,他们惯用的攻击方法通常是:“如果话语能够决定一切”;“如果任何事物都为了话语服务”;“如果光强调话语不考虑现实”,那么……<sup>[16]</sup>他们这样做充分说明,他们认为在话语和非话语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分和界限。但是,这种观点,尤其经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语言、翻译、认知问题方面几十年来取得了长足发展,不再具有多大的杀伤力了。这个理论有点儿像信仰问题,团结真正的信徒,排斥异端分子,但是不能继而引申为一个不证自明的真理。就像理查德·洛蒂指出的那样,哲学研究中试图弄清楚“语言与客观世界的联系”等传统工作“是不可实现的事情,就像我们不能摆脱自己的身体一样,即是说我们不能摆脱传统、语言以及其他的局限性,因为我们必须借助它们并在它们的限制范围内进行思考和自我批判,然后将我们得出的结论与某些绝对的东西进行对比验证”。<sup>[17]</sup>客观世界独立存在于语言之外,但是我们永远不能确定(除了它的真实存在之外),因为离开语言和有关认识的传统理论去谈论世界的存在是难以想象的<sup>[18]</sup>。福柯认为:“我们一定不要把话语问题看成对已有概念的重新演绎;我们一定不要世界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张清晰明朗的面孔,因为客观世界是需要我们付出努力去认真解读的;我们掌握的知识不会任何时候都能轻易地解释客观事物;对于话语问题,没有已经存在的可以借鉴的东西,期望以此轻而易举地了解世界。”<sup>[19]</sup>

分析概念在历史上对话语研究的作用和地位,我们必须摒弃那种将